

制造愤世嫉俗者

——郁达夫与《卢骚传》

杨 振

一

郁达夫于1928年1月16日发表在《北新》上的《卢骚传》，是在读了梁实秋1927年重刊于《复旦旬刊》上的《卢梭论女子教育》后，写成的一篇为卢梭正名的“传赞”^①。而梁实秋之文又是在读了1923年6月版魏肇基译卢梭《爱弥儿》后写成的，其目的是为此书第五卷正名。魏肇基在译序中，一面将卢梭塑造成追求自由平等、反抗专制的浪漫主义者，一面又对《爱弥儿》第五卷关于女子教育的论说大加鞭挞。魏肇基认为，此卷不承认女子的人格，和前四卷的尊重人类相矛盾。他感叹说：“此实感染于十余年来底潜势，虽遇天才，也不免要受些影响呢。”^②

在魏译《爱弥儿》一书中，我们读到如下段落：

① 郁达夫：《翻译说明就算答辩》，《郁达夫全集》第10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21页。本文所引郁达夫文章，除特殊注明外，均出自该版《郁达夫全集》，以下不另注。

② 卢梭：《爱弥儿》，“序”，魏肇基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第2页。

过于有才能的女人,是夫君底鞭笞,是儿童底鞭笞,是朋友底鞭笞,是婢仆和各种人底鞭笞。自傲优胜底天才,旁若无人,抛弃女子底义务,而踏男人于足下,所谓牝鸡司晨,出家而常为人所笑骂,离自己固有的地位,而迷惑于不当的地方。[……]妇人底荣誉,在于夫底可尊处;妇人底欢乐,在于家庭底幸福中。读者诸君,我欲问于你们——诸君如入于妇女底房中,看见她从事于自己底职务,留心于家事,儿童底衣服,满置于身边底时候,和看见她在缝台上写诗歌,或摆满小册子和纸片等物底时候,你们对于哪一方面,觉得舒服呢?③

“牝鸡司晨”一句的原文是:“像朗克罗小姐那样做男人式的女人。”④ 妮依·德·朗克罗是法国17世纪一位颇有思想的女文士。魏肇基用“牝鸡司晨”这样的中式短语,可以恰到好处地翻译卢梭的原文。这说明,他在《爱弥儿》第五卷中发现了当时正在受到质疑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子⑤。

在《爱弥儿》第五卷中,可以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对女性的要求相印证的文字比比皆是。再举一例:

女人一生,必须服从于严厉的一种束缚就是礼法,所以常使她从小惯于此种束缚,而不再觉得束缚;又为服从于他人底意志,必须养成她有抑制自己底桀骜心底习惯。[……]

惯于束缚,遂产生女儿一生所不可缺底服从心,女儿常常须服从于男人,及男人底判断,而不可逾越。女人第一要紧就是柔和;男人虽不完全,虽不道德,虽有缺点,女子必须服从于这个,所以必须从幼学

③ 卢梭:《爱弥儿》,前揭,第277-278页。

④ Jean-Jacques Rousseau, *Oeuvres complètes*, IV, Bernard Gagnebin et Marcel Raymond (éd.),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Paris, Gallimard, 1969, p. 768.

⑤ 这一点在下面引文中也可以看出。魏肇基将法文«bienséances»翻译成“礼法”,而这正是被新文化运动者视为革命对象的传统的象征。

习能够忍耐夫君底不正,夫君虽不德,而不会叨念。^⑥

面对魏肇基对卢梭反启蒙思想的责难,梁实秋在《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中,用符合自然法则的道理来为卢梭辩护,同时把《爱弥儿》前四卷的内容,批判为“无一是处”^⑦。这一点引来了鲁迅和郁达夫的极度不满,各自撰《卢梭和胃口》及《卢骚传》讽刺梁实秋,影射白璧德,制造出一个追求自由、平等的卢梭形象,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论战。

梁实秋在《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中,并没有说出比卢梭自己的言论更出格的话。而鲁迅和郁达夫在上述两篇文章中,大肆攻击梁实秋和白璧德,对《爱弥儿》第五卷的内容,却只字不提。《卢骚传》尚未发表时,郁达夫又紧接着写了一篇《卢骚的思想和他的创作》,最终发表于1928年2月1日《北新》杂志。相比《卢骚传》,此文中卢梭的形象得到了部分补充和修正,其矛盾的性格得到彰显。然而谈到《爱弥儿》时,郁达夫以尽量中立的口吻简述了此书第五卷的内容,然后轻描淡写地结论说:“这一种教育学说,虽然也有许多矛盾和不近人情的缺点在里头,但《爱弥儿》一书的影响之大,就是在现代的教育思潮里,也还可以指点得出来。”^⑧

女性解放并非不是郁达夫要关心的话题。恰恰相反,打破传统女性道德,与郁达夫的切身利益休戚相关。《卢骚传》发表前一年,正是他和王映霞由初识到热恋的日子。1927年年初,郁达夫在给王映霞的一封信中写道:

听说你对茗溪君的婚约将成,我也不愿意打散这件喜事,可是王女士,人生只有一次婚姻,结婚与情爱,有微妙的关系,你但须想想你当结婚年余之后,就不得不日日作家庭的主妇,或抱了小孩,袒胸哺乳

⑥ 卢梭:《爱弥儿》,魏肇基译,前揭,第241-242页;Jean-Jacques Rousseau, *Œuvres complètes*, IV, Bernard Gagnebin et Marcel Raymond (éd.),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Paris, Gallimard, 1969, pp. 709-711.

⑦ 梁实秋:《卢梭论女子教育》,转引自黎照编注《鲁迅梁实秋论战实录》,北京华龄出版社1997年,第85页。其实卢梭在《爱弥儿》第四卷中论品位一段就已经表示了对女性的歧视:Jean-Jacques Rousseau, *Œuvres complètes*, IV, *éd. cit.*, p. 673。魏肇基的译本中没有相关段落。

⑧ 郁达夫:《卢骚的思想和他的创作》,《郁达夫全集》第10卷,第392-393页。

等情形,我想你必能决定你现在所应走的路。

你情愿做一个家庭的奴隶吗?你还是情愿做一个自由的女王?
你的生活,尽可以独立,你的自由,绝不应该就这样的轻轻抛去。^⑨

以上分析已经表明,郁达夫在《卢骚传》中构造的卢梭形象,有特意制造的成分。这篇传记一开头,郁达夫便将卢梭经典化。他写道:“法国也许会灭亡,拉丁民族的文明,言语和世界,也许会同归于尽,可是卢骚的著作,直要到了世界末日,创造者再来审判活人死人的时候止,才能放尽它的光辉。”^⑩在本文第三部分,我们将分析郁达夫使用同类经典化话语策略时所隐藏的心理动机。目前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这段话常为郁达夫与卢梭关系的研究者们征引,以证明后者对前者影响之深远^⑪。但绝大部分研究者并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郁达夫创作上的某些特点,仅仅来自卢梭而非其他外国或中国作家。他们忽视了郁达夫刻意制造一个卢梭的可能。同时,他们鲜少提到卢梭在《爱弥儿》第五卷中表现出的反启蒙精神。强调卢梭所体现的现代性,以及他对郁达夫的影响,无疑有助于强化郁达夫作为现代作家的形象。相关研究者在制造卢梭形象时,与郁达夫不谋而合。

以较早且较详细分析卢梭对郁达夫影响的《郁达夫新论》为例。作者认为,卢梭的孤傲愤世和漂泊者情怀影响了郁达夫^⑫。他写道:“卢梭晚年那种长期苦斗后的失望,对庸俗环境的仇视以及近乎神经质的被迫害感等等,都可以使中年以后渐趋消沉的郁达夫找到某种慰安,找到用沉静清闲掩盖伤痛的办法。”^⑬作者塑造的卢梭形象,与郁达夫在《卢骚传》中塑造的卢梭形象十分吻合。尽管作者意识到郁达夫的评论有时不尽客观,但他仍

⑨ 郁达夫:《致王映霞》,《郁达夫全集》第6卷,前揭,第63-64页。

⑩ 郁达夫:《卢骚传》,《郁达夫全集》第10卷,前揭,第399页。

⑪ 如许子东:《郁达夫新论》(增订本),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237页;钱林森:《迎迓与容纳:法国文学在中国的世纪历险》,《当代外国文学》2006年第1期,第132页;范伯群、朱栋霖:《中外文学比较史(1898-1949)》,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76-277页。

⑫ 许子东:《郁达夫新论》(增订本),前揭,第243页。

⑬ 同上书,第238页。

然选择了相信郁达夫所塑造的卢梭形象的真实性。

郁达夫在《卢骚传》开头说：“现在让我来谈一谈这一位到处受压迫，到处中毒箭，流离四方，卒至晚年来因疯自杀的人类解放者的生涯。”^⑭接近尾声时，他又写道：“然而几年来尝遍了谋害他的人的险恶的居心和受的虐待的种种，使他变成了一个完全厌弃社会，不喜交际的密桑斯洛毕斯脱。”^⑮《卢骚传》中卢梭形象的最大特点即是愤世嫉俗。表现在卢梭固守清贫，不善逢迎，且或因受迫害，或因不屑与庸人共处，一生四处搬迁。这个愤世嫉俗者的卢梭如何被塑造成？

二

在《卢骚传》中，郁达夫注明他参考了《忏悔录》。在文末附注中，他又指出，他一共参考了四位作者的作品：约翰·莫莱(John Morley)，亨利·博杜安(Henri Beaudouin)，弗朗西斯·格里布尔(Francis Gribble)和阿蒂尔·许凯(Arthur Chuquet)^⑯。莫莱和格里布尔为英国批评家，博杜安和许凯是法国批评家，他们每人至少各作有一本关于卢梭的作品^⑰。郁达夫说自己这篇文章匆匆作成，其中事件和时间特别参考了许凯的书。这可以理解：比起其他三部作品，许凯的作品最短。经比对我们发现，郁达夫确实曾读过许凯的《让·雅克·卢梭》一书：郁文中关于卢梭幼时隐忍心善，为他人着想的段落，几乎照抄了许凯书中的相关段落^⑱。但我们又发现，从

⑭ 郁达夫：《卢骚传》，《郁达夫全集》第10卷，前揭，第399页。

⑮ 同上书，第415页。

⑯ 这个附注出现在1997年版的《鲁迅梁实秋论战实录》第121页中。2007年版的《郁达夫全集》第10卷由于采用了《敝帚集》中的版本，该注被略去。为统一起见，本文郁达夫的文字，除特殊注明外，均采用2007年版的《郁达夫全集》。

⑰ John Morley: *Rousseau*,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1873/New York, Scribner and Welford, 1878/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10; Francis Gribble: *Rousseau and the women he loved*, New York, C. Scribner's sons, 1908/London, Eveleigh Nash, Fawside House, 1908; Henri Beaudouin: *La vie et les œuvres de Jean-Jacques Rousseau*, Paris, Lamulle et Poisson, 1891; Arthur Chuquet: *J. -J. Rousseau*, Paris, Hachette, 1893/1901/1906/1913.

⑱ 郁达夫：《卢骚传》，《郁达夫全集》第10卷，前揭，第400-401页；Arthur Chuquet, *J. -J. Rousseau*, Paris, Hachette, 1893, pp. 7-8.

2007年版《郁达夫全集》第10卷第402页起,郁达夫的文章便不再与许凯的作品相吻合,一直到第414页最后一段,才又出现明显照抄许凯作品的痕迹。

郁达夫的英文水平应该可以让他无障碍地阅读两位英国批评家的原著。至于郁达夫的法文水平是否足以流畅阅读许凯和博杜安的全书,我们无从考证。在《南迁》和《茫茫夜发表以后》中,郁达夫均引用过法文^①。可以肯定的是,比起德、日、英三语,法语不是郁达夫的强项:据其1927年日记记载,那一年他所买的三本法国文学作品,非德译本即英译本^②。而他所翻译的《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也是依据英、日译本转译^③。

尽管如此,我们仍不妨假设郁达夫在写作《卢骚传》时,同时参考了以上五本书^④。下面选取《卢骚传》中若干段最能够反映卢梭愤世嫉俗性格的段落,逐一对比《忏悔录》、许凯的《让·雅克·卢梭》、莫莱的《卢梭》、格里布尔的《卢梭与他爱的女人们》和博杜安的《让·雅克·卢梭的生活与创作》相关段落,指出郁达夫叙述中可能经历的取舍过程,重构郁达夫撰文时的心理过程。

1750年,卢梭的《科学艺术论》获得第戎学院征文奖金,文名大增。郁达夫这样写道:

在文坛上露了头角,他的决心,更加坚固了起来,所以在这一年中,勿兰克油请他去任会计主任,他也辞而不就,并且连七八年来担任着的屠潘夫人的秘书一职,也辞掉了。他只靠着抄写乐谱,来维持他的穷文士的生活。然而他的名誉,竟一天一天的大了起来,门前成市,来访者络绎于途。^⑤

郁达夫在这里塑造了一个坚守清贫的作家形象。然而关于勿兰克油

① 郁达夫:《郁达夫全集》第1卷,前揭,第131页;第10卷,第31、32页。

② 郁达夫:《郁达夫全集》第5卷,前揭,第141、165、205页。

③ 郁达夫:《郁达夫全集》第12卷,前揭,第460页。

④ 许凯的作品1926年由神部孝翻译成日文,在新潮社出版。郁达夫也可能阅读过此本。

⑤ 郁达夫:《卢骚传》,《郁达夫全集》第10卷,前揭,第407-408页。

请卢梭任会计主任一事,《忏悔录》中的叙述恰恰相反:卢梭虽然不喜欢当会计,却说服自己接受了这一职位,并认为这是成熟理智的表现。虽然他走马上任未久,仍以辞职告终,其直接缘由却不是因为要遗世独立,而是因为心理素质欠佳。据卢梭自己说,他上任不久,勿兰克油先生便出门旅行,留他独自一人管理两三万法郎的存款。虽然数额不大,他却坐立不安,甚至因此染疾。他的好友屠潘夫人请来名医,诊断结果是卢梭将不久于人世。他闻讯,心下生出一番感叹,决定辞职。他写道:

这番话引起了我对现状的严肃思考。为一个我丝毫不喜欢的职位牺牲所剩不多的休憩和娱乐时光,实在愚蠢之至。再说,我刚刚决定践行的那些至理名言,如何能与我现在的状态吻合?我难道能够一面宣扬无私和清贫,一面却又做着财政总长的出纳?这些想法在我脑海中和我的体温一同发酵,日益显示出它们的力量,以至于万物不能动摇。^{②④}

卢梭在“科学艺术论”中宣扬人造文明无用论,号召返朴归真,皈依自然。因此有理论和实践不能契合之虑。此文发表后不久,卢梭便身体力行。他取下金饰和佩剑,戴上圆形假发,脱去白长筒袜,变卖手表。最后,他妻子家的兄弟偷走了他的所有衣服,正好帮他完成了外表革新。上文郁达夫说卢梭的文名日益剧增,访客络绎不绝,其实背后省略了一个细节:正是卢梭的此种外表革命,引来了众多好奇者。这一点,卢梭在《忏悔录》中也有所言及。他抱怨时间过多被占用,不得安宁。于是决定采取如下策略:

现在我决定把所谓的礼节践踏于脚下。我变得蛮横而尖刻,其实

^{②④} Jean-Jacques Rousseau, *Œuvres complètes*, I, édition publiée sous la direction de Bernard Gagnebin et Marcel Raymond avec pour ce volume, la collaboration de Robert Osmond, Paris, Gallimard, 1959, pp. 361 - 362.

是因为内心羞惭；我假装藐视礼貌，其实是因为我不知如何行礼。这种近乎粗鲁的做派与我的新原则倒是吻合，它在我的灵魂里得到升华，竟成为一种无畏的优点。我敢说，正是有了这一名正言顺的基础，这种做派才得以被我保持较长时间。这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因为我为此所做的努力，其实与我的天性相违。^{②5}

许凯在其作品中，以讽刺的口吻引用了卢梭的观点。他说，文学上的成功让卢梭变得骄狂。他以为自立门派，引得追随者无数，其实只不过刺激了别人的好奇心。当他发现好事者多到一发不可收拾时，又刻意夸大他愤世嫉俗的一面^{②6}。许凯的这一段，郁达夫很可能读过。因为在不远处，许凯书中将“科学艺术论”写成“文学艺术论”，而郁达夫照搬了这一名称^{②7}。郁达夫应该会惊讶于许凯的讽刺，他尤其不能够采用“愤世嫉俗是一种刻意制造的态度”这一观点。然而在他所引用其他的三位批评家作品中，除莫莱特别强调卢梭刚一成名，便刻意清贫自守，实属真诚所至外^{②8}，其余两位均毫不留情地揭示了卢梭刻意以清贫为范背后的动机。格里布尔引用他认为代表了洞察世事者的马蒙泰尔(Marmontel)的话说：

他有自成一派的野心，不甘心做某个哲学流派中的一员小将，而想成为他自己门派中的领袖和唯一的教师。然而，像布丰那样，没有争论，悄然声息地退隐人世，达不到他要的目的。为了吸引人们的眼光，他决定装出一副老哲学家的姿态。^{②9}

博杜安则认为，卢梭此举很聪明。如果他礼貌和蔼，那人们就得说 he 好；如果他无礼而落落难合，那就是他所宣扬的皈返原始淳朴的原则所致。

^{②5} Jean-Jacques Rousseau, *Œuvres complètes*, pp. 368 – 369.

^{②6} Arthur Chuquet, *J. -J. Rousseau, éd. cit.*, pp. 32 – 33.

^{②7} 郁达夫：《卢骚传》，《郁达夫全集》第10卷，前揭，第407页；Arthur Chuquet, *J. -J. Rousseau, éd. cit.*, p. 31.

^{②8} John Morley, *Jean-Jacque Rousseau*, vol. 1, *éd. cit.*, pp. 206 – 207.

^{②9} Francis Gribble, *Rousseau and the Women He Loved*, *éd. cit.*, p. 184.

博杜安因此结论说:

一般说来,我们对于那些特立独行的道德家所谓唯我独有的优点,当予以怀疑。他们在那些无须劳神之处,表现得格外严厉,而在很多其他方面,很快又补偿了回来。我们把他们的这种道德教训称为不痛不痒型道德。[……]当人们要给自己上枷锁时,总是特别拣又松又轻的上。^{③0}

郁达夫忽视了《忏悔录》中叙述的卢梭因性格的制约力求入世而不得的一面,同时也忽视了英法批评者所揭示的卢梭遗世独立行为背后隐藏的动机,刻意制造了一个不为社会名利所动的卢梭形象。如果我们对比郁达夫的敌人学衡派评论家对于相关片段的论述,则更能够突出郁达夫此处美化卢梭的用意。郁文发表同年几个月后,《学衡》刊登了《卢梭逝世百五十年纪念》一文,其中只有一句话:“不录。(读者可参阅本志第十八期《圣伯甫评卢梭〈忏悔录〉》)篇首按语。”^{③1}在刊登于1923年6月的《圣伯甫评卢梭〈忏悔录〉》一文前有一篇编者识,其中写道:

卢梭性怯懦,而举止笨拙,语言讷滞,又衣饰不整,礼节未谙。故交际场中动貽笑柄,不能得志。初本欲力学常时之礼俗规矩而未能,自惭自愤之余,而转而肆行攻击,提倡革命,媚世之术未工,乃一变而为之傲世。益行不自检,冠服奇异,遇人辄加白眼,然非其本志也。^{③2}

《学衡》编者的这番言论,很可能继承了白璧德的观点^{③3},与郁达夫的言论恰恰相反,而与《忏悔录》以及许凯、格里布尔和博杜安的相关论述不谋而合。由此可见,在不同动机的批评者笔下,同一个作家可以呈现出截

^{③0} Francis Gribble, *Rousseau and the Women He Loved*, ed. cit., p. 265.

^{③1} 《卢梭逝世百五十年纪念》,《学衡》第65期,第42页。

^{③2} 《圣伯甫评卢梭〈忏悔录〉》,徐震谔译,《学衡》第18期,第4页。

^{③3} Irving Babbitt, *Rousseau and Romanticism*,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19, p. 174.

然相反的形象。

1754年夏天,卢梭接受戈费古尔(Gauffecourt)的建议与其同行,携家眷从巴黎回到日内瓦居住。郁达夫写道:

然而在巴黎的成功,日内瓦人也传听到了,十几年前飘然出去的这一个浪子的还乡,居然在小小的日内瓦国里,惹起了掀天的大浪,他的乡人都以见他一面为荣,故国的河山,也为产生了他而生色了。但是,啊,这一种盲目的群众感情,翻变又何以会如此之速!^{③4}

在这样的环境下,愤世嫉俗的卢梭显然不会久留。隔了一段,郁达夫便又写道:

在故乡住了四个月,他看了乡人的那一种假道德的行为,和伪善者的迷信,实在有点不耐烦起来了,所以就又离开了日内瓦,回到了巴黎。[……]然而今后的定住计划,实在有点使他不得不东西迷惘着,寻不到一个最上的方法。若住在巴黎呢,因为外务太多,反而不能安心著作,住在日内瓦呢,又因为乡人的迷顽,有碍于他的哲学上的意见的发表。并且服尔德当时也住在日内瓦,这一位功名心很热,嫉妒心很大,善在王侯贵族前趋奉的名文家,也难免没有因嫉妒而毁损他的举动。^{③5}

然而,卢梭并未像郁达夫一样觉察出乡人们的势利。在《忏悔录》中,他这样描写:

一到这座城市,我心中便油然升起一股吸引我归来的共和国的热情。这种情怀伴随着我所受到的优待与日俱增。人们祝贺我,款待

③4 郁达夫:《卢骚传》,《郁达夫全集》第10卷,前揭,第408页。

③5 同上书,第408-409页。

我,我完全沉浸在一种爱国热情中。^{③⑥}

卢梭在日内瓦重新改信新教,取回日内瓦公民权。在此过程中,日内瓦教务机构为其大开绿灯,破例允许他不出席教务会议,并为他专门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接受其宣誓。卢梭颇受感动,他写道:

议会、教务委员的善意,所有法官、部长和公民的热情和真诚,令我备受感动。再加上不停来看望我的好人德·吕克先生一再敦促,尤其我自己也是心之所向,使得我决定先返回巴黎解散我的大家庭,将各类杂事处理妥当,安置好勒瓦瑟尔(Le Vasseur)太太和她丈夫,或给他们一笔生活费用,之后便和我的泰蕾兹(Thérèse)回日内瓦安度余生。^{③⑦}

卢梭自己的论述与郁达夫的论述大相径庭。许凯在相关段落中对于日内瓦居民对卢梭的态度,保持中立,也未提及卢梭打算重回日内瓦一事^{③⑧}。莫莱也保持中立,但提到了卢梭打算回日内瓦一事^{③⑨}。格里布尔和博杜安则像郁达夫一样感叹日内瓦人的势利和虚伪,不顾卢梭道德上的缺陷和他对宗教虔诚与否,便欣然接受他改宗。但他们并未说这是卢梭离开日内瓦的原因^{④①}。

在第三部分,我们将通过郁达夫对于国民性问题的思考,分析他强调日内瓦居民势利虚伪背后可能存在的心理原因。在此我们指出,塑造日内瓦居民的负面形象,无疑为塑造正义的愤世嫉俗者卢梭的形象提供土壤。通过抹黑卢梭周围的人来反衬卢梭之伟大的逻辑也出现在上述引文对伏尔泰形象的塑造上。《卢骚传》发表前,伏尔泰每次均以正面形象出现在

^{③⑥} Jean-Jacques Rousseau, *Œuvres complètes*, I, éd. cit., p. 392.

^{③⑦} Ibid.

^{③⑧} Arthur Chuquet, *J.-J. Rousseau*, éd. cit., pp. 34 – 35.

^{③⑨} John Morley, *Jean-Jacques Rousseau*, vol. I, éd. cit., pp. 220 – 228.

^{④①} Francis Gribble, *Rousseau and the Women He Loved*, éd. cit., p. 190; Henri Beaudouin, *La vie et les œuvres de Jean-Jacques Rousseau*, tome premier, éd. cit., pp. 304 – 306.

郁达夫笔下:第一次是开启法国 19 世纪文学光辉的雄辩家^①,第二次是和卢梭一样愤世嫉俗、倡导高尚政治理想的浪漫主义艺术家^②。到了《卢骚传》中,伏尔泰则变成了趋炎附势、热衷功名且心地阴险的文士。

如果说在我们上文所选择的段落中,郁达夫均摒弃了《忏悔录》中的论述,论及卢梭与伏尔泰的关系,郁达夫的论述却与卢梭自己的论述格外一致。卢梭说他为何最终决定放弃回日内瓦定居的计划:

有件事特别让我拿定了主意,那就是伏尔泰住在日内瓦附近:我明白这个人要把那里闹得翻天覆地。我知道,在我的祖国,我将随处都会遭遇那种逼我迁出巴黎的腔调、神色和风气。[……]我这样一个孤独、腼腆且不善辞令的人,如何能够抗得过他那样一个傲慢、富有、讨大人物欢心、能言善辩,且已成为妇女和年轻人偶像的人?我怕要使自己的勇气徒然受挫;我决定只凭自己平和的天性和对安宁的热爱行事。^③

郁达夫在《卢骚传》中曾说,《忏悔录》中的言论“半虚半实”^④。以上分析显示,郁达夫在有利于经典化卢梭之时,便选择相信《忏悔录》,否则便背弃之。然而郁达夫所参考的四位批评家,却毫不留情地揭露卢梭的言行背后可能隐藏的动机。他们中没有一位相信卢梭此处的说法。许凯说:“回日内瓦定居便意味着与伏尔泰为邻。他明白,这个杰出、富有、强势、受妇女和年轻人热爱的作家将会在他的家乡抢尽他的风头。”^⑤格里布尔、

① 郁达夫:《〈女神〉之生日》,《郁达夫全集》第 10 卷,第 34 页。

② 郁达夫:《文学上的阶级斗争》,《创造周报》第 3 号,1923 年 5 月 27 日,第 1 页。在这篇文章中,伏尔泰和卢梭的名字并列。作者同时用中法文标注了伏尔泰的名字:“佛儿泰而 Voltaire。”有意思的是,当此文被收录在 1930 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达夫全集》第五卷《敝帚集》中时,伏尔泰的名字被删除。这很可能是郁达夫为了前后一致而做出的有意之举。也许从《卢骚传》发表时起,他便觉得,有必要把伏尔泰塑造成他经常提及的“名利熏心的伪文学家”。2007 年版的《郁达夫全集》第 10 卷由于采用了《敝帚集》中的文章,也没有伏尔泰的名字。见郁达夫《敝帚集》,上海北新书局 1930 年,第 148 页;《郁达夫全集》第 10 卷,前揭,第 41 页。

③ Jean-Jacques Rousseau, *Œuvres complètes*, I, éd. cit., pp. 396 - 397.

④ 郁达夫:《卢骚传》,《郁达夫全集》第 10 卷,前揭,第 404 页。

⑤ Arthur Chuquet, *J. -J. Rousseau, éd. cit.*, p. 36.

博杜安和莫莱均表达了类似的观点^{④6}。莫莱在复述了卢梭的观点后说：“也许怀疑这是否是真实的原因并非没有道理。因为没有人比卢梭更会为自己的选择冠之以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在这方面，他是顶聪明的大师。”^{④7}

郁达夫制造的愤世嫉俗者卢梭，是一个孱弱而凄惨的愤世嫉俗者。曾有论者根据郁达夫在《卢骚传》中冠给卢梭的名号，如“反抗的诗人，自由平等的拥护者，大自然的骄子”，认为郁达夫在此文中构建了一个他只能远远羡慕却不能认同的“强壮的、充满生气的、要自我主宰生命的英雄的积极、精悍的西方形象”^{④8}，我们认为这不妥当。如果我们把此文中论述自《爱弥儿》发表到流亡英国以前卢梭生活每每发生变故的段落抽出来观察，便会发现卢梭一再迫于社会压力，不得已流亡^{④9}。特别是临行英国前的一段，卢梭显得格外狼狈。我们节录如下：

然而正义人道，在这世上终不会占到胜利的。卢梭受了墨底爱儿村民的攻击，又不得不走了，一七六五年九月六日的晚上，他住的小屋前头，竟飞来了许多乱石，他就不得不逃往皮恩奴湖(The Lake of Bienné)中的一个小岛圣披爱而(St. Pierre)岛上去藏身。但是号称自由独立国的瑞士，在这独立国中的独立市白尔恩(Berne)，也传染了逼迫大思想家的热病了，他在圣披爱而岛上，又接受了退去之令。他甚至于向白尔恩的上院，提出了情愿你们赐我一个监狱的请愿，可是正义之声，又哪里能够摇动这些迷妄的议员，所以他终不得不于十一月廿九日，离开瑞士，走向德国的境内去。在斯屈拉斯婆儿古(Strasburg)小住了一月，到一七六五年的年底，又回到了巴黎。在巴黎，他受了留古散蒲儿

^{④6} Francis Gribble, *Rousseau and the Women He Loved*, *éd. cit.*, p. 202; Henri Beaudouin, *La vie et les œuvres de Jean-Jacques Rousseau*, tome premier, *éd. cit.*, pp. 399 - 340; John Morley, *Jean-Jacque Rousseau*, vol. I, *éd. cit.*, pp. 228 - 229.

^{④7} John Morley, *Jean-Jacque Rousseau*, vol. I, *éd. cit.*, pp. 228 - 229.

^{④8} 李欧梵著，王宏志等译：《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新星出版社2010年，第120-121页。

^{④9} 郁达夫：《卢骚传》，《郁达夫全集》第10卷，前揭，第412-413页。

古公爵夫人、康底(Conti)亲王等的保护,总算免了生命之危。^{⑤①}

许凯却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不太一样的风景。其书中的相关段落共分四节,第一节叙述卢梭在圣皮埃尔岛(即郁文中的圣披爱而岛)上度过的美好时光;第二节以中立的口吻叙述伯尔尼上议院下逐客令;第三节叙述卢梭在斯特拉斯堡大受欢迎和受到款待的盛况;第四节叙述卢梭在巴黎访客络绎不绝^{⑤②}。

即使是倾向于强调自己备受欺凌的卢梭在《忏悔录》中也说,他离开墨底爱儿村去圣皮埃尔岛,并非唯一的选择。当时很多名流贵胄都邀他去同住。他之所以选择这座小岛,是因为舍不得离开瑞士^{⑤③}。至于他在圣皮埃尔岛上度过的幸福时光,卢梭在《忏悔录》中长篇大论叙述之^{⑤④},格里布尔、莫莱和博杜安的书中也都有专门论述^{⑤⑤}。

《忏悔录》终止于卢梭离开瑞士一段。关于卢梭在斯特拉斯堡和巴黎的境遇,郁达夫可以参考的只有几位批评家的作品。除莫莱外,许凯、博杜安和格里布尔都详细说明了卢梭在斯特拉斯堡受到的优待^{⑤⑥}。其中格里布尔引用卢梭致迪佩鲁(Du Peyrou)的信说,斯特拉斯堡剧院的经理不仅为卢梭专门准备了一个包厢,甚至为他配了一把剧院后门的钥匙,让他可以自由出入而不被别人看见。为表感谢,卢梭将自己的几份戏剧手稿赠送给剧院经理。格里布尔嘲讽卢梭一面在理论上反对设立剧院,一面却又在斯特拉斯堡很享受剧院中的种种特权。他说:

在卢梭看来,面对人们热情的掌声,自己对于戏剧的偏见像太阳

⑤① 郁达夫:《卢骚传》,前揭,第412-413页。

⑤② Arthur Chuquet, *J.-J. Rousseau, éd. cit.*, pp. 60-61.

⑤③ Jean-Jacques Rousseau, *Œuvres complètes*, I, *éd. cit.*, p. 636.

⑤④ Ibid., pp. 636-645. 另,卢梭在《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第五散步中也有相关内容的长篇描写。

⑤⑤ Francis Gribble, *Rousseau and the Women He Loved, éd. cit.*, pp. 358-359; John Morley, *Jean-Jacques Rousseau*, vol. II, *éd. cit.*, pp. 108-115; Henri Beaudouin, *La vie et les œuvres de Jean-Jacques Rousseau*, tome deux, *éd. cit.*, p. 354.

⑤⑥ Arthur Chuquet, *J.-J. Rousseau, éd. cit.*, p. 61; Henri Beaudouin, *La vie et les œuvres de Jean-Jacques Rousseau*, tome II, *éd. cit.*, p. 369; Francis Gribble, *Rousseau and the Women He Loved, éd. cit.*, pp. 362-363.

下的积雪一样融化得不见踪影纯属正常。同样正常的是,当欢乐打断哲思时,哲学应当为了不打扰私人生活而被禁止。^{⑤⑥}

这一点显然不符合郁达夫制造愤世嫉俗者卢梭的要求。由此可见,郁达夫之所以对卢梭的斯特拉斯堡之行一笔带过,一方面可以制造作家悲惨的境遇,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叙述卢梭社会性的一面。

至于卢梭在巴黎的逗留,郁达夫的文字给我们造成的感觉是卢梭有生命危险。许凯和莫莱没有提到卢梭是否可能被处以死刑。格里布尔不这么认为。他说:“针对他的逮捕令没有撤销。但只要他谨慎行事,逮捕令便几乎没有被实施的可能。”^{⑤⑦}博杜安也表达了类似观点^{⑤⑧}。

由此可见,郁达夫刻意夸大了卢梭所受的压迫,将他的处境描绘得格外悲惨。这也为他解释卢梭到英国后为何会得被迫害妄想症埋下伏笔。郁达夫说,卢梭是“一个被逼迫而变得神经过敏的人”^{⑤⑨},这样便把卢梭病情的责任完全推到了社会头上。许凯书中未曾提及卢梭得病的原因。格里布尔认为英国潮湿多雾的天气才是罪魁祸首。因为这种天气引得卢梭痛风发作,而痛风病人最容易多疑多虑。英国饮食的粗劣也是原因之一^{⑥⑩}。博杜安将卢梭的妄想症视作“多年来卢梭已经习惯了的一种心理状态的过分扩大”^{⑥⑪}。莫莱也多强调内因。他说,卢梭得病的根源,在于他对幸福有着无穷尽的期盼,情感有余而理性不足。当这种追求幸福的热忱超越了理智的界限控制作家的存在时,便演变成疾病^{⑥⑫}。

以上分析表明,郁达夫所参考的四位评论家的作品,几乎都在以各自的方式解构着卢梭愤世嫉俗的形象,甚至卢梭自己在《忏悔录》中也不讳

^{⑤⑥} Francis Gribble, *Rousseau and the Women He Loved*, éd. cit., pp. 362 – 363.

^{⑤⑦} Ibid., p. 363.

^{⑤⑧} Henri Beaudouin, *La vie et les œuvres de Jean-Jacques Rousseau*, tome II, éd. cit., pp. 372 – 373.

^{⑤⑨} 郁达夫:《卢骚传》,《郁达夫全集》第10卷,前揭,第414页。

^{⑥⑩} Francis Gribble, *Rousseau and the Women He Loved*, éd. cit., p. 391.

^{⑥⑪} Henri Beaudouin, *La vie et les œuvres de Jean-Jacques Rousseau*, tome II, éd. cit., p. 425.

^{⑥⑫} John Morley, *Jean-Jacques Rousseau*, vol. II, éd. cit., pp. 297 – 300.

言愤世嫉俗其实并非自己的天性。郁达夫却通过省略、简化和扭曲等手段,强化卢梭与社会的对立,制造出一个甘守清贫、无法容忍周围人的势利和虚伪、一生为社会恶势力所逼迫、遭遇悲惨的卢梭。为何郁达夫要强调卢梭与社会的对立?为何社会就象征着恶?为何他要突出卢梭的潦倒和狼狈?又为何偏偏是卢梭?下面我们以郁达夫和卢梭对社会与个人关系的思考为切入点,从思想、美学,以及对人的生存境遇的思考等方面分析郁达夫写作《卢骚传》的心理动机,以及其中的卢梭形象与1928年以前郁达夫笔下卢梭形象存在的内在关联。

三

郁达夫的《卢骚传》针对梁实秋对卢梭的批评而发。《卢骚传》发表后,二人又撰文数篇,就卢梭是否值得被经典问题,互相攻讦^③。他们二人对于理想的知识分子品格,有着根本不同的看法。这一点特别表现在他们对各自引用的外国批评家的形象塑造上。梁实秋一再强调白璧德学识渊博,在学界地位崇高。然而对于郁达夫来说,学识深浅根本不是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品格,人格是否独立才是关键。梁实秋对郁达夫引用的辛克莱的学术资历进行质问,对此,郁达夫引《拜金艺术》译者序作答。在此序中,郁达夫列举辛克莱三大优点:安贫乐道、不与权贵合作、无做首领的欲望^④,条条都针对辛克莱与社会的对立而发。这一形象与卢梭的形象甚为吻合。

郁达夫认为,卢梭代表了与社会对立的知识分子典型。卢梭对社会价值的否定,在梁实秋所批判的《爱弥儿》前四卷中展露无遗。卢梭认为,人类社会所制造的智慧和各种习俗,不过是一系列奴役和控制别人的手

③ 见郁达夫《卢骚的思想和他的创作》,《北新》,II-7,1928年2月1日;梁实秋:《读郁达夫先生的〈卢骚传〉》,《时事新报·书报春秋》,第46、47期,1928年2月5日、2月12日;郁达夫:《翻译说明就算答辞》,《北新》,II-8,1928年2月16日;梁实秋:《关于卢骚——答郁达夫先生》,《时事新报·书报春秋》,第53期,1928年3月25日;郁达夫:《关于卢骚》,《北新》,II-12,1928年5月1日。

④ 郁达夫:《〈拜金艺术〉译者的话》,《郁达夫全集》第12卷,前揭,第211页。

段^⑤。控制欲的养成与教育有关。卢梭说,孩子最初的哭泣往往是发出请求的信号,可如果家长一味纵容,让孩子意识到他的哭泣的支配力量,孩子便会把哭泣变成一种威胁,从表达需求转变成表达命令,这便是控制欲的起源。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对他人的依赖逐渐减少,可是命令欲却并不随之削弱,因为支配他者让他的虚荣心得到满足^⑥。

卢梭认为,其实人的真正支配权,不会超出自然赋予他的用以保存自身存在的力量之外。将天赋的自我支配权扩张至他人身上,意味着掉入被他人统治的陷阱。因为要笼络人心,必须推心置腹,借别人的眼睛看世界。卢梭这样说:

你自豪地说,我的人民都是我的属民。好。那么你呢,你又是谁? 你是你臣子的属民。你的臣子们,他们又是谁? 他们是他们的办事员、情人的属民,是他们奴仆的奴仆。你把所有东西都占为己有,都抢到手,然后再张开双手四处撒钱;造大炮、绞刑架和用作刑罚的车轮,颁布法律、政令;增加间谍、士兵、刽子手、监狱和镣铐的数量:可怜的小人们,这些东西都有何用? 你们不会因此得到更好的服务,被偷和被骗的不会更少,也不会变得更加完美。你们总是说:我们要如何如何;而事实上,你们总是在为他人所要而奔命。^⑦

卢梭认为,人的真正财富不是支配他者而是自足自乐。社会的种种认同机制,即卢梭所谓的偏见和制度,却让个体变得无法自足自乐。社会人的幸福来自他者的认同而非自己内心的满足。在此意义上,社会让人变得像时刻需要依赖他人的孩子一样脆弱。攀比、诱惑、嫉妒、失望轮番折磨着被虚荣心吞噬的社会人,将之异化。如卢梭所言:“红尘中的人完全被罩在面具之下。他几乎从不属于自己,总是个陌生者,当他不得不退出红尘

^⑤ Jean-Jacques Rousseau, *Œuvres complètes*, IV, éd. cit., p. 253.

^⑥ Ibid., pp. 289 - 290.

^⑦ Ibid., p. 309.

之外时,会觉得无比艰难。他所是的对他来说什么也不是,他所看起来是其实不是的就是他的全部。”^⑥

所以,卢梭在他的教育理论中,将各种刺激、威胁、竞争和表现欲都扫地出门。在谈到知识传授时,卢梭严防学生滋生虚荣心。因为虚荣心是社会舆论的产物^⑦,社会舆论是偏见的代名词。追逐虚荣意味着以他者为主臬,这样很容易掉入社会认同机制设定的框架,丧失认识社会的清醒意识。卢梭将学习动机分成两类:

我们应当时刻将自然倾向与来自舆论的倾向区分开来。有一种求知的热情仅仅建立在希望被视为学识渊博者的欲望之上,而另一种则建立在人对于或近或远让之感兴趣的事物的天然好奇心基础上。^⑧

卢梭强调教师应当把知识传授的领域限定在学生有天然求知需求的范围之内,在孩子的理性未到充分发展的年龄前,不要急于给孩子灌输礼貌、社会、道德和义务等与他者息息相关的理念^⑨。关于具体的学习知识的方法,卢梭对于人类社会的知识构建保持万分警惕。他说:

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最糟糕的史学家就是那些喜欢做出判断的史学家。事件!告诉学生事件!让他自己去判断;这样学生才能学会认识人。如果作者的判断一刻不停地在引导着他,那他所做的就是一直用别人的眼睛看世界,当别人的眼睛不再时,他眼前便一团漆黑。^⑩

卢梭强调,要教会学生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心去感受,要做到除了自己的理性外,任何一种外在的权威都不能够支配自己的思想。他呼

^⑥ Jean-Jacques Rousseau, *Œuvres complètes*, IV, *éd. cit.*, p. 515.

^⑦ *Ibid.*, p. 409.

^⑧ *Ibid.*, p. 429.

^⑨ *Ibid.*, pp. 312 - 313, 316 - 317.

^⑩ *Ibid.*, p. 528.

喊道：“哦，孩子，但愿有一天，在看透人间舆论所承载的虚荣，尝过激情的痛苦后，你能在离自我很近的地方发现智慧之路，发现人生的代价和我们曾为之绝望的幸福之源。那时你会如释重负！”^{⑦③}

比起理性，卢梭更强调情感和直觉的作用。这恰恰是理性所告诉他的。他说：

我只知道，真理在事物本身而不在对它们做出判断的我的头脑里。在判断中我所加入的自我成分越少，我就越确信可以接近真理。就这样，我的理性向我确证了更多求助于感情而非理性的法则。^{⑦④}

这一观点的基础在于，卢梭相信，与生俱来的直觉和感情使人具有判断对错的本领^{⑦⑤}，而社会的偏见和习俗则会玷污本来纯洁而正直的心灵。

以上对《爱弥儿》前四卷部分内容的简述可以让我们理解，为何梁实秋会持着“道德礼法人情纪律”^{⑦⑥}的标尺将这四卷斥为一文不值。郁达夫的社会观与卢梭在许多方面相吻合。在1916年至1921年创作的诗词和信件中，郁达夫多次表达了出世之心^{⑦⑦}，这一点无疑与卢梭不谋而合。不过，深重的家国关怀又使得郁达夫希望为国效力，这一点则非卢梭所有。至少在《卢骚传》中，郁达夫未曾强调卢梭对于日内瓦的责任感。创作于1916年、后收入《沉沦》的《席间口占》，集中代表了郁达夫这一时期的复杂心态：衿衡借鹦鹉表达怀才不遇之情；梁鸿一面出潼关隐居，一面却又回望洛阳，作《五噫歌》。1919年秋，郁达夫应试外交部招考失败，加深了他此前已多次表达的怀才不遇之情^{⑦⑧}。

如果说1916年，在“秋兴”一诗中，郁达夫一面批评各自为己谋利、旗

^{⑦③} Jean-Jacques Rousseau, *Œuvres complètes*, IV, éd. cit., pp. 602 - 603.

^{⑦④} Ibid., p. 573.

^{⑦⑤} Ibid., p. 286.

^{⑦⑥} 梁实秋：《读郁达夫先生的〈卢骚传〉》，转引自黎照编注《鲁迅梁实秋论战实录》，第101页。

^{⑦⑦} 郁达夫：《郁达夫全集》第7卷，第28、95、106 - 107页；第6卷，第5页。

^{⑦⑧} 郁达夫：《郁达夫全集》第7卷，第83、88、106页。

鼓争侯的军阀,一面却仍呼吁“诸公努力救神州”^⑭,1923年,郁达夫对于人世者似乎只剩下质疑和批评。甚至原先传承自历史的家国观念,此时也受到质疑。在这一年发表的《艺术与国家》一文中,他引用庄子《南华经》中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焉”,表达对国家和入世为官者的否定。他说:“把中国的历史上大家所知道的事实来一看,我们就可以知道真诚者都不得不失败,而成功的都是些虚伪的人。”^⑮1927年4月22日的日记中,他又写道:“我平生最恨的是做官,尤其是那些懒惰无为的投机官僚,中国的所以弄得不好的,一大半就因为这些人的原因。”^⑯

郁达夫对入世者的批判往往与对国民性的思考纠缠在一起。在作于1920年6月20日的一首诗中,郁达夫便感叹“中原事已不可为矣”^⑰。1923年,他批评中国人具有无耻和贪婪的劣根性^⑱。在写作《卢骚传》前一年(1927年),郁达夫对国民性的批评变得格外强烈。这与他在创造社经历的与社员的矛盾有关。1926年12月11日、1927年1月6日和1月12日的日记中,郁达夫因创造社内部整改受挫,三次感叹中国青年之良心丧尽^⑲。在此后的文字中,对整个国民的批判经常出现在他笔下。在1927年3月29日的日记中,他写道:“唉,黄帝的子孙,中华的民族,我觉得人心已经死尽了,现在的革命,恐怕也不过是回光返照的一刹那。”^⑳4月8日,在《在方向转换的途中》,郁达夫写道:“足以破坏我们目下革命运动的最大危险,还是中国人脑筋里洗涤不去的封建时代的英雄主义。”^㉑4月11日,在《公开状答日本山口君》一文中,郁达夫更是长篇大论,揭露中国青年的利己思想,做官发财、假公济私的思想。他最后总结道:“要打倒一两个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是容易得很,可是要打倒这一种中国民族的卑劣阴

^⑭ 郁达夫:《郁达夫全集》第7卷,第38页。

^⑮ 郁达夫:《艺术与国家》,《郁达夫全集》第10卷,第58-59页。

^⑯ 郁达夫:《郁达夫全集》第5卷,第156页。

^⑰ 郁达夫:《郁达夫全集》第7卷,第98页。

^⑱ 郁达夫:《苏州烟雨记》,《郁达夫全集》第3卷,第57页。

^⑲ 郁达夫:《郁达夫全集》第5卷,第58-59、68、73页。

^⑳ 同上书,第139页。

^㉑ 郁达夫:《在方向转换的途中》,《郁达夫全集》第8卷,第26页。

险性,却真是谈非容易。”^{⑧7}

除英雄主义外,强调道德、名誉等社会价值亦被郁达夫认为是中国人的劣根性之一。在1927年2月11日致王映霞的信中,郁达夫写道:

伯刚那里,好几天不去了。因为去的时候,他们总以中国式的话来劝我。说我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他们太把中国的礼教、习惯、家庭、名誉、地位看重了。他们都说我现在不应该牺牲(损失太大),不应该为了这一回的事情而牺牲。不过我想我若没有这一点勇气,若想不彻底的偷偷摸摸,那我也不至于到这一步了。所以他们简直不能了解我现在的心状,并且不了解什么是人生。人生的乐趣,他们以为只在循规蹈矩的刻板生活上面的。^{⑧8}

像卢梭一样,郁达夫将礼教、习惯、家庭、名誉、地位等与社会、他者紧密相关的价值观念视作异化人的工具,并且认为这一切背后其实是虚荣心在作祟。几个月后,在致王映霞的另一封信中,郁达夫说:“更希望你能够安于孤独,把中国的旧习惯打破,所谓旧习惯者,依我看来,就是无谓的虚荣。”^{⑧9}以上两段引文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何郁达夫坚持要将卢梭故国的日内瓦居民塑造成伪道德的迷信者:郁达夫希望将卢梭与自己认同,于是给卢梭虚构了一个与自己相似的境遇。

郁达夫否定只能带来无谓的虚荣的社会价值,追求永恒。在作于1923年9月的《集中于〈黄面志〉(The Yellow Book)的人物》一文中,他说:“一时成功的世上的 Parvenu 哟,你们的眩光,只能欺同时代的人的耳目,‘时间’的判决会把你们的月桂冠换成狗头帽的呀!”^{⑨0}在此文中,郁达夫强调了《黄面志》作者们如何在与社会的对立中寻求艺术上的成功。他运用了和《卢骚传》开头十分相近的修辞策略来经典《黄面志》作家们:“文艺季

^{⑧7} 郁达夫:《公开状答日本山口君》,《郁达夫全集》第10卷,第276页。

^{⑧8} 郁达夫:《致王映霞》,《郁达夫全集》第6卷,第73-74页。

^{⑧9} 同上书,第142页。

^{⑨0} 郁达夫:《集中于〈黄面志〉(The Yellow Book)的人物》,《郁达夫全集》第10卷,第98页。

刊 *The Yellow Book*, 与那一群少年天才的命运一样,到了1897年,出了第十三期就绝命了,然而他们的余光,怕要照到英国国民绝灭的时候,才能湮没呢!”^⑨由此可见,郁达夫在卢梭身上寄托了一种永恒的理想。

然而在与社会对立的状态中,人如何追求永恒?《沉沦》以追求不到爱情的愤世嫉俗者的自杀作结。我们可以说,这篇小说的表现对象,是主人公自杀前为了在这个世界上继续生存所做的挣扎和努力。大自然、性和美的创造成为他的寄托。其中唯一未曾让主人公失望的,似乎就是第三项。郁达夫认为,人生就是一场空。他说:“可怜的读者诸君——请你们恕我这样的说——你们若能看破人生终究是悲哀苦痛,那么就请你们预备,让我们携着手一同到空虚的路上去罢!”^⑩换句话说,人生不过是一场戏,其意义就在于做戏的姿态。《沉沦》的主人公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他要刻意演一出悲剧,制造一种凄凉的美感,以获得内心的满足。这就是为什么,一旦他发现身后有一个农夫出现,便“把他脸上的笑容改装成一副忧郁的面色,好像他的笑容是怕被人看见的样子”^⑪。这也是为什么,他要把自己“所受的苦处夸大的细数起来”,“并觉得悲苦的中间,也有无穷的甘味在那里”^⑫。

郁达夫后来的文字,一再印证了这一美学理念。在作于1924年3月7日的《北国的微音》一文中,他写道:

沫若!我觉得人生一切都是虚幻,真真实在的,只有你说的“凄切的孤单”,倒是我们人类从生到死味觉得到的唯一的一道实味。就是京沪报章上,为了金钱或者想建筑自家的名誉的缘故,在那里含了敌意,做文章攻击你的人,我仔细替他们一想,觉得他们也在感着这凄切的孤独。^⑬

⑨ 郁达夫:《集中于〈黄面志〉(The Yellow Book)的人物》,《郁达夫全集》第10卷,第86页。

⑩ 郁达夫:《〈茑萝集〉自序》,《郁达夫全集》第10卷,第70页。

⑪ 郁达夫:《沉沦》,《郁达夫全集》第1卷,第43页。

⑫ 同上书,第64页。

⑬ 郁达夫:《北国的微音》,《郁达夫全集》第3卷,第80页。

郁达夫从具体的社会纷争中摆脱出来,从人的存在境遇层面去理解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得出体会“凄切的孤单”是人生意义的结论。两个月后,在《介绍一个文学的公式》中,郁达夫表达了抒情可以达致永恒的观点。他举雪莱和李清照的两首诗为例说:“像这一种文学,系完全以情绪为主的,并没有中心的观念,所以一般人都说这一种文学,是言之无物,是无病呻吟。殊不知这种文学,却确有永久的价值的。我们在上面所举的两首诗词,大约无论如何主张哲理诗写实诗的人,总应该承认它们的永久性吧!”^{⑨6}1927年,在《序孙译〈出家及其弟子〉》中,郁达夫在民众解放运动日渐高涨,文学日趋务实的背景下,为感伤主义文学正名:“然而再回头来一想,把古今的艺术总体积加起来,从中间删去了感伤主义,那么所余的还有一点什么?莎士比亚的剧本,英国18世纪的小说,浪漫运动中的各诗人的作品,又哪一篇得完全脱离感伤之域?”^{⑨7}

郁达夫的这一美学理念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作于1923年7月30日的《还乡记》中,郁达夫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现代作家重构古典悲情意境的情景:

沉静的这杭州故郡,自我去国以来,也受了不少的文明的侵害,各处的旧迹,一天一天的被拆毁了。我走到清泰门前,就起了一种怀古之情,走上将拆而犹在的城楼上去。城外一带杨柳桑树上的鸣蝉,叫得可怜。它们的哀吟,一声声沁入了我的心脾,我如同海上的浮尸,把我的情感,全部付托了蝉声,竟做梦似的站在丛残的城堞上,看那西北的浮云和暮天的急情,一种淡淡的悲哀,把我的全身溶化了。这时候若有几声古寺的钟声,当当的一下一下,或缓或徐的飞传过来,怕我就要不自觉的从城墙上跳入城壕,把我灵魂和入晚烟之中,去笼罩着这故都的城市。然而南屏还远,Curfew今晚上是不会鸣了。我独自一人冷清清地立了许久,看西天只剩了一线红云,把日暮的悲哀尝了个饱

^{⑨6} 郁达夫:《介绍一个文学的公式》,《郁达夫全集》第10卷,第107-108页。

^{⑨7} 郁达夫:《序孙译〈出家及其弟子〉》,《郁达夫全集》第10卷,第377页。

满,才慢慢地走下城来。^⑧

在若干天后作的《还乡后记》中,郁达夫再度发挥自己的想象,制造一出传统的送葬情景,满足自己对悲凉感的美学需求。撰文的时间是晴天赤日的农历六月,江岸青山绿树,波光浩荡,郁达夫却幻想着此时正烟雨模糊,愁云惨淡。他写道:

我此刻更想有一具黑漆棺木在我的旁边。最好是秋风凉冷的九月十月之交,叶落的林中,阴森的江上,不断地筛着渺濛的秋雨。我在凋残的芦苇里,雇了一叶扁舟,当日暮的时候,再送灵柩归去。小船上除舟子而外,不要有第二个人。棺里卧着的,若不是和我寝处追随的一个年少妇人,至少也须是一个我的至亲骨肉。我在灰暗微明的黄昏江上,雨声淅沥的芦苇丛中,赤了足,张了油纸雨伞,提了一张灯笼,摸上船头去焚化纸帛。^⑨

有趣的是,在这样一幅传统中国的画面中,那少妇却有一个法文名字:Jeanne。作为一个饱读古代诗书的现代中国作家,郁达夫也积极地在世界文学中寻找创造悲剧戏剧性的资源。与社会对立且被社会打败的外国作家,成为郁达夫的首选。所以在具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南迁》中,他这样描绘伊人:

到了日本之后,他的性格竟愈趋愈怪了,一年四季,绝不与人往来,只一个人默默的坐在寓室里沉思默想。他所读的都是那些在人生的战场上战败了人的书,所以他所最敬爱的就是略名 B. V. 的 James Thomson, H. Heine, Leopardi, Ernst Dowson 那些人。他下了火车,向行李房去取来的一只帆布包,里边藏着的,大约也就是这几位先生的诗

^⑧ 郁达夫:《还乡记》,《郁达夫全集》第3卷,第23-24页。

^⑨ 郁达夫:《还乡后记》,《郁达夫全集》第3卷,第39-40页。

在写于1923年5月19日的《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一文中,郁达夫这样描绘卢梭:“表面上似与人生直接最没有关系的新旧浪漫派的艺术,实际上对人事社会的疾愤,反而最深。不过他们的战斗力不足,不能战胜这万恶贯盈的社会,所以如卢骚等,在政治上倡导了些高尚的理想,就不得不被放逐。”^[11]可见,卢梭也作为人生战场上的失败者,被郁达夫引为文学上的知己。对于郁达夫来说,卢梭完美地象征了与社会对立的悲情作家的形象。1927年8月出版的《文学概说》中,郁达夫将卢梭视为法国殉情主义作家的代表^[12]。在他看来,《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最能代表其抒情特质。在《南迁》和《一个人在途上》中,郁达夫两次引用此书。现引《南迁》为例:

日光射在海岸上,沙中的硅石同金刚石似的放了几点白光。一层蓝色透明的海水的细浪,就打在他们的脚下。伊人俯了首走了一段,仰起来看看苍空,觉得一种悲凉孤冷的情怀,充满了他的胸里,他读过的卢骚著的《孤独者之散步》里边的情味,同潮也似的涌到他的脑里来。^[13]

可见,《卢骚传》之所以刻意强调卢梭受社会压迫之深重,不仅因为郁达夫要强化卢梭作为愤世嫉俗者的形象,同时还要制造一个身世悲凉的抒情文学家,以便向之认同。但是,笔者认为,《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说理推论的成分大于抒情,而且卢梭在其中明确表示,他具有一种活跃性

[10] 郁达夫:《南迁》,《郁达夫全集》第1卷,第96页。

[11] 郁达夫:《文学上的阶级斗争》,《郁达夫全集》第10卷,第41页。

[12] 郁达夫:《文学概说》,《郁达夫全集》第10卷,第332页。

[13] 郁达夫:《南迁》,《郁达夫全集》第1卷,第130页。另见郁达夫:《一个人在途上》,《郁达夫全集》第3卷,第129页。

格,这种性格使他不至于一味消沉,陷于无尽的忧郁状态^⑩。这一点与郁达夫正好背道而驰。郁达夫刻意强调了这部作品的抒情特质^⑪,体现出其与卢梭认同的迫切心理。卢梭将情感视为人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在这个意义上说卢梭是殉情主义作家,是合适的。但郁达夫偷换了“殉情主义”的概念^⑫,把卢梭变成了一个像他自己一样的悲情作家。

从上面的引文来看,《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似乎也没有再现什么中国式的抒情所无法传述的主题或风格。郁达夫之所以仍然征引卢梭,除有展示自己外国文学知识这一可能的心态外,还可能希望通过用典以增加作品的诗意。正如郁达夫古典诗词中通过大量用典来增加诗歌的历史感和诗意一样,此处对卢梭的遥指无疑增加了伊人孤独漫步场景的诗情画意。基于这一思考,我们发现《沉沦》中对法文“manteau”(大衣)的使用可能存在的意义:

荒野的人间,只有几家为学生而设的旅馆,同晓天的星影一般,散缀在麦田瓜地的中央。晚饭毕后,披了黑呢的缦斗(le manteau),拿了爱读的书,在迟迟不落的夕照中间散步逍遥,是非常快乐的。他的田园趣味,大约也是在这 Idyllic Wanderings 的中间养成的。^⑬

“缦斗”并非中文常用词汇。郁达夫之所以创造这个词,很可能是向法文“manteau”认同。这让我们想到同样喜欢在大自然中漫步的卢梭穿的亚美尼亚长袍。据《忏悔录》记载,1762年至1765年,卢梭因《爱弥儿》中阐述的宗教思想遭到迫害,避居墨底爱儿村。《山中来信》的发表,让该村村民也将卢梭视为异端,希望将其驱逐出境。卢梭的亚美尼亚长袍更是给

^⑩ Jean-Jacques Rousseau, *Les rêveries du promeneur solitaire, Œuvres complètes*, I, Bernard Gagnebin et Marcel Raymond (éd.),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Paris, Gallimard, 1959, p. 1066.

^⑪ 在《卢骚的思想和他的创作》一文中,郁达夫也一味强调《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的抒情成分。他认为,这部作品“是最深切、最哀婉的一个受了伤的灵魂的叫喊。[……]孤独的人,读到此书,总没有一个禁得住不为他或自己而落泪的。”见郁达夫《卢骚的思想和他的创作》,《郁达夫全集》第10卷,第397页。

^⑫ 郁达夫:《文学概说》,《郁达夫全集》第10卷,第329-330页。

^⑬ 郁达夫:《沉沦》,《郁达夫全集》第1卷,第55页。

了村民们将其视为怪人的口实。卢梭穿着袍子走在路上,竟遭到村民们投石攻击^⑩。梁实秋在《读郁达夫先生的〈卢骚传〉》一文中所谓“卢骚妖装异服,戴着皮帽子,披着大衣,招摇过市”^⑪,正是就此而言。郁达夫曾说,《忏悔录》前六章具有“一种 Romantic, Idyllic 的色彩”^⑫,而上述段落出现在第十二章。因此可能的情况是:郁达夫虚构了一个披着长袍在田园风光中漫步的卢梭,并让小说主人公与之认同。与《南迁》对卢梭的征引略有不同的是,《沉沦》的主人公不仅是在比附,更是在“表演”卢梭。这位在人生的舞台上喜欢进行跨语际表演(如翻译华兹华斯和海涅的诗,不时地说几句英文)的孤独青年,在对这些他者形式的借用中制造了更多的戏剧性,也赋予了自己的生命或者说表演更多的意义。

对于追名逐利的政客、伪文人的深恶痛绝,对于中国国民性痛彻心扉的思考,让郁达夫成为一个愤世嫉俗者。这就是为什么当他遇见对人为构建的社会价值表示充分质疑的卢梭时,便迫不及待地将其视作追求思想独立的知识分子予以认同。然而,《忏悔录》、《爱弥儿》和关于卢梭的研究书籍,打破了郁达夫对于这位遥远知音人格魅力的幻想。尤其是他所参考的卢梭研究者们,以高度怀疑的精神解构了卢梭愤世嫉俗的形象。郁达夫无疑感受到一定程度的失望。但是,面对质疑启蒙者的攻击,充满启蒙责任感和解构经典精神的郁达夫,却又不得不制造一个新的经典以作启蒙的武器。卢梭对于郁达夫来说,不仅是启蒙者。对于郁达夫这样一个诗意的存在,启蒙后面临的孤独和空虚,需要通过创造美和戏剧性来补偿。在这一点上,对于遥远的卢梭的文学想象,为习惯于通过用典来制造美的郁达夫,提供了创造生命意义的美学手段。

⑩ Jean-Jacques Rousseau, *Œuvres complètes*, I, éd. cit., pp. 627-628.

⑪ 梁实秋:《读郁达夫先生的〈卢骚传〉》,黎照编注《鲁迅梁实秋论战实录》,北京华龄出版社1997年,第101页。

⑫ 郁达夫:《卢梭的思想和他的创作》,《郁达夫全集》第10卷,第396页。